

中國革命史專題研究

● 楊樹楨 王星昌 徐寶珠 主編

●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专题研究

(下 册)

杨树桢 徐宝珠 王星昌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专题研究

(上、下册)

杨树桢 徐宝珠 王星昌 主编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共西安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3.5 字数500千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7-5613-0185-5

K·16 定价：6.70元

目 录

下 册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原因新论·····	房成祥 (387)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中的几个问题·····	徐宝珠 (400)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	陈志远 (420)
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战场·····	陈志远 (434)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战场·····	陈志远 (450)
抗日战争时期的汪伪政权·····	张国星 (462)
沦陷区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残暴统治的 斗争·····	李世达、李 晏 (476)
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党派·····	成希斌 (490)
抗日战争时期的苏美对华政策·····	李学诗 (504)
华侨在祖国抗战中的贡献·····	刘 煜、郑生寿 (517)
少数民族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	屈志义 (532)
中国两种命运的斗争·····	陈答才 (540)
试论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贡献·····	张建祥 (553)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及全面内战的 爆发·····	王德孝 (562)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李少莹 (572)
试析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特点及胜	

利的原因·····	陈平社 (583)
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及其地位·····	毛世信 (594)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杜翰 (606)
民主党派的新觉醒·····	成希斌 (615)
三大战役的作战方针与历史意义	
·····	牛兴华、杨延虎 (629)
国民党和谈阴谋的破产·····	王星昌 (643)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和伟大	
意义·····	杨树楦 (654)
试论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	
转变·····	马启民 (671)
建国初期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	
根本好转及其基本经验·····	马启民 (688)
试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杜兴运 (702)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成功赎买·····	刘鸿喜 (716)
“八大”前后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的初步探索·····	王继 (728)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原因新论

在研究西安事变的论著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捉住蒋介石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没有主见，束手无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主要得益于中共。另一种观点认为，最早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不是中共中央，而是张学良。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张杨二将军始终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而中共中央所派的代表团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是“协助”张杨二将军，主次不能颠倒。本文围绕这个中心，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些粗浅的论述。

一、张杨将军力持和平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说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是社会历史合力造成的。但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坚持“内求和平，外求抗战”的宗旨和“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原则。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开动宣传机器，攻击西安事变，诬蔑张杨发动兵谏是“不惜破坏国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是犯上作乱的行为，在国情上是万无可宽恕

的。”①南京政府中的“讨伐派”利用这种舆论，主张调动军队，分3路向西安进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张杨二将军，要求限期交出蒋介石，声称：如不交出蒋介石，“必率全军指日西上”②。12月16日，在何应钦的操纵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30次会议，确定：“一、何委员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二、由国民政府即下令讨伐；三、推于委员右任宣慰西北军民。”③17日，何应钦通电就讨逆军总司令职，筹组讨逆总部④，并不顾宋美龄的阻拦，以讨逆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所谓“讨伐令”，叫嚣“扫荡叛逆，以靖凶氛”⑤。他调兵遣将，指挥中央军向西急进，还派大批飞机在西安上空示威，轰炸渭南、三原等地。由于中央军向东北军、十七路军步步进逼，使国内出现了极为紧张的形势，新的大规模的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种形势下，新的内战不能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张、杨对事变的态度。如果他们对南京方面的“讨伐派”针锋相对，新的内战就可能发生。然而，张、杨虽然以武力要求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随行的南京政府要员，但却始终避免同南京方面发生武装冲突。张学良、杨虎城17日再致阎锡山电中把他们的思想、愿望阐述得再清楚不过了，电文写道：“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且尽其所能，

①《西安事变与勘乱》。

②1936年12月16日《西北文化日报》。

③⑤1936年12月17日《中央日报》

④《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专编》上，第509页。

避免内战。”^①他们不仅有这种强烈的愿望和正义的主张，而且还以忘我的牺牲精神付诸实施，力持和平。

首先，西安事变发生时，张、杨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抗日救国运动的八大主张，其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此后，他们一再呼吁避免内战。12月14日，张学良在广播词中强调：“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15日，杨虎城在广播词中也强调：“这次的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是抗日，不是内战。”16日，张学良又派秘书长吴家象发表广播讲话，重申张、杨的主张，即“反对消灭实力的残酷内战。”不难看出，西安事变如何解决，张、杨的意向是非常清楚的。他们为了实现抗战，首先是争取实现国内和平。

其次，在何应钦发布讨伐令，部署“讨逆军”向西急进时，突出地表现了张、杨力持和平的态度和立场。何应钦派遣军事要员飞抵洛阳，部署内战军事，张学良不得不电令东北军各部开赴反讨逆军事前线待命。电报命令：“此间派军队甚急，仰将所部主力迅先轻装星夜急进，务将每到达位置，限宿营后迅速具报。”^②十七路军也作出相应的部署。同时，张学良致电何应钦，谴责他“西入潼关”，“肆行轰炸”，“动干戈”，“起内战”。张将军坚定地表示：“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张、杨调动军队的目的并不是为

^①《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35页。

^②1936年12月17日《新北平》。

了。在军事上战胜何应钦，争个高低，拼个你死我活，而是以一定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制止何应钦的进攻，达到“内求和平”的目的。所以，张、杨的军事部署始终是被动的、防御的，不是主动的，进攻的。因此，尽管何应钦“动干戈”，寻战挑衅，但大规模的内战始终未能发生。

再次，张学良陪蒋介石赴南京后，蒋介石不但在南京软禁他，而且还调兵西进，分5个路军和6个纵队对西安包围推进，在华阴，华县一带又出现了爆发新内战的危险形势。这时，杨虎城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最高统帅。他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在战与和的问题上，虽然有过摇摆，但总的来说还是坚持了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原则。所以，尽管主战派向他施加压力，他还是毅然领衔，于2月4日发表了“和平宣言”，重申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宗旨。他在宣言中写道：

“此间去年‘双十二’之事，旨在对内求和平，对外求抗战，……盖‘双十二’之举，原期永息内战，一致对外，谁复愿以对外之力量，供对内之牺牲”。^①他为了顾全大局，在种种条件制约之下，接受了南京方面提出的《陕甘军事善后办法》的有关规定，东北军东开，十七路军重新编制。这样，西安事变善后也终于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所以能得到和平解决，除了张、杨坚持了“内求和平”的宗旨外，还由于他们正确地解决了关于蒋介石的处置问题。尽人皆知，西安事变爆发后，西安顿时同南京处于公开的敌对状态。这时，怎样处置蒋介石成为西安方面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这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西安事变

①《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42-143页。

朝什么方向发展的关键。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发生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张、杨“内求和平”的目的就不可能达到，如果处理得当，就可能避免内战，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张、杨看到了处置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影响，所以捉住蒋介石后，立即发表了对时局通电，明确地提出了对蒋“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原则。事变中，他们向外反复宣传这个原则。如张学良致孔祥熙电，申明对蒋介石“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张学良、杨虎城致冯玉祥、李烈钧电，声明“请蒋公暂留西安，保障一切安全，以便反省”；张学良、杨虎城致程潜、唐生智电也表示“请蒋介石公暂留西安，以得觉悟”。这个原则反映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的基本态度，对于西安变事的和平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张杨“兵谏”，是他们拥蒋的继续。他们兵谏不是与蒋介石争权，不是要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也不是要伤害蒋介石，损害蒋介石的威信，而是为了抗日。因此，张学良布置捉蒋任务时，强调不能伤害蒋介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突然去向不明，张学良焦虑万分。他在指挥部对两军将领和幕僚们说：若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戴他为领袖。杨虎城在广播词中表示：“一二·一二的举动在意义上完全是为爱护委员长而发动的，即是我们不忍坐视他的政策错误到底，做了我们中华民国的罪人。”^①蒋介石羁留西安期间，张、杨对蒋仍以委员长相称，道惊致歉，执礼甚恭。

^①1936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

当然，这时的拥蒋与事变前的拥蒋也有所不同，即蒋介石暂时失去了自由，不是张、杨服从蒋介石的剿共命令，而是蒋介石要接受张、杨联共抗日的主张。正如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中所说：“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委员长能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显然，事变后拥蒋有了条件，即蒋介石必须“主持抗日工作。”张学良给宋美龄的电报也说：“倘介公实行积极抗日，良仍当竭诚拥护。”

第二，张、杨兵谏是他们多次净谏、逼蒋抗日的继续。事变前，张、杨为了联共抗日，对蒋介石净谏已经到了“用尽心机”，“唇敝舌焦”的程度，但均被蒋介石拒绝。他们为了使蒋介石能够反省，不得不实行兵谏，张学良说这是“不得已而行权”^①。由于他们采用兵谏的形式，使蒋介石脱离南京政府“群小包围”，又暂时处于失去自由的状态，迫使蒋介石有可能改变以往的错误。历史雄辩地证明，恰恰是由于张、杨的兵谏，才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接受了联共抗日的主张。

第三，拥蒋、逼蒋，只要蒋介石改弦更张，答应八项条件，必然放蒋。就是说，“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八字原则包含着放蒋的思想，在一些函电中也明确表示了这一思想。正因为如此，当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后，他们立即释放了蒋介石，张学良还毅然亲送蒋介石回南京。

第四，这个八字原则特别是对蒋介石“保其安全”，有

^①1936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

利于分化南京政府中英美派和亲日派，促使英美派迅速地转变到抗日战线方面来，有利于击破南京政府中讨伐派发动内战、取蒋而代之以的阴谋，使何应钦不敢轻举妄动，内战得以避免。西安方面再三声明对蒋介石“绝对不能稍加危害”，蒋介石在西安“极为安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西安方面求得“对内和平”的一个卓越的策略。

张、杨两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不但以非凡的行动领导发动西安事变，而且在事变过程中提出了包含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思想的具有远见的八字宗旨和八字原则，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对此应予充分肯定。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提出和平解决西安变变的明确方针。从现在掌握的材料看，西安事变期间张、杨发表的声明通电、讲话，都没有提到和平解决的方针，甚至连“和平解决”这4个字也找不到，和平解决西安变变的明确方针是中共中央提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

二、宋氏兄妹力主政治解决

西安变变的和平解决，除张、杨坚持不懈的努力外，还应该承认，蒋介石最终采取明智的态度，表示转变其10年的错误政策，接受张杨联共抗日的主张，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否则，假如缺少蒋介石转变政策这一面，国内和平也很难实现。

事变期间，蒋介石为什么要制止何应钦的进攻，为什么要采纳张、杨的“救亡要图”？这固然与蒋介石为形势所迫有关，也与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对张、杨发动事变的行为表示理解，赴西安说服蒋介石，通过谈判，谋求政治解决有关。

12月12日，宋美龄、孔祥熙都在上海，闻讯后于晚11时离沪赶回南京。宋子文正在由香港返上海途中，13日抵沪。宋美龄对何应钦等主张讨伐和12日晚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所作的决议，极为不满，表示坚决反对。她央请端纳赴西安探视情况，并积极活动，陈述用和平方法营救蒋介石的重要性。15日，端纳向宋美龄报告西安的情况，说明有和平解决的可能，转达张学良对她和孔祥熙的邀请。因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不能离开南京，征得张、杨的同意，由宋子文代替孔祥熙。由于宋氏兄妹的坚持和主和派的努力，经过几天争论，19日，国民党中央作出了决定，准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去西安，营救蒋介石。20日，宋子文抵达西安，弄清了西安的情况，随即返回南京报告，22日，宋氏兄妹飞往西安，劝蒋介石顾及个人安危，考虑国家民族，促使他同意了西安方面停止内战，一抗致日的主张。随后，宋氏兄妹抛开“私人”身份，根据蒋介石的决定出面谈判。西安方面以救亡图存的大局为重，同意他们作代表参加谈判，商定的条款可不鉴书面协议。宋氏兄妹识时务，同意以张、杨的八项主张为谈判基础。谈判中，对于“撤兵”、“停止剿共”、“释放爱国领袖”、“组织满人意政府”等项，二宋表示“负责”、“负绝对责任”、“担保”“愿负全责”。经过两天谈判，达成六项协议，即：“（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宋氏兄妹答应这些条

件，说明蒋介石已经被迫“全面采纳”了“救亡要图”，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蒋介石同意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周恩来向宋子文提出要与蒋介石“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宋答可先见宋美龄。”①24日，宋美龄与周恩来长谈，并促成了国共两党高级领导人周恩来与蒋介石的直接对话。蒋介石表示接受双方谈定的条件，并邀周恩来前往南京继续谈判。这些事实说明，宋氏兄妹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也是发挥了作用的。

宋氏兄妹为什么主张政治解决？为什么积极奔走？这固然同众所周知的宋家与蒋介石有特殊的私人关系密不可分，也与英美集团的要求密切相关。宋氏兄妹是南京政府中英美派的代表，他的行动反映了英美的在华利益和愿望。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要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使它同企图在中国保持既得利益的英帝国主义和不断在中国扩展势力的美帝国主义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利害冲突。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发生了西安事变，英美帝国主义很自然地希望他们的代理人蒋介石能得到释放，结束内战，抵抗日本，以保护他们在华的利益。所以，宋氏兄妹的行动，应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外交诸因素错综复杂的关系决定的。尽管如此，我们不应该否认，宋氏兄妹的行动，至少在客观上对实现国内和平作出了贡献。

三、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

那末，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期间起了什么作用呢？毛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1-72页。

泽东说：“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毛泽东这段客观的叙述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是“调停”宁陕双方的矛盾冲突，实现国内和平。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而且“协助”张、杨妥善地处理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和南京间是处于矛盾、对立中的双方。当时，缓解双方的矛盾，消除双方的对立状态，避免内战，是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愿望。中共中央高瞻远瞩，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积极调停。为了尽快实现党的方针，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态度及其处理办法也迅速地作了调整，由主张“审蒋”变为“保蒋安全”以至主张“放蒋”，对谈判问题也由不以蒋介石为对手（以南京政府为对手）变为以蒋介石为对手。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期间所采取的这种方针和策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发展，旨在通过和平解决事变和释蒋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中共代表团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推行深入细致的调停工作，特别是由于周恩来“施展绝妙的才能”^①，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17日，中共中央所派代表团到达西安时，西安和南京处在极端的对立状态之中，许多问题都还悬而未决。如：国民

①1976年1月9日（朝日新闻）。

党中亲英美派想营救蒋介石，必须满足张、杨提出的救亡图存的要求；张、杨要达到联共抗日的目的，必须由蒋介石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联共抗日的政策。但这些都还是悬案。所以，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为实现和平解决的方针，就要做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在张、杨和蒋之间进行调停，以平息争端，团结抗日。

红军代表团在西安和南京间进行调停，不是不偏不倚，而是站在民族抗战的立场上，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

南京方面，国民党内部存在着抗战与妥协、英美派与亲日派的矛盾，西安事变发生后又产生了“讨伐派”与“政治解决派”的矛盾。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南京转向抗日的立场，中共中央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中央书记处分别致电西安、天津和上海党组织，指示他们号召人民起来，推动南京及各地政权中的欧美派、元老派、抗日派、积极站在抗日救亡方面，推动宋子文、孔祥熙、孙科、蔡元培、李石曾去争取英美法三国谅解西安事变，15日、18日、19日，中共中央连续发表通电，谴责“讨伐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同时声明，南京如进攻西安则蒋的安全无保证，以此来牵制南京政府中的讨伐派。20日，宋子文到达西安，周恩来抓住这个时机，通过各种渠道做宋子文的工作，希望他说服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贡献。

西安方面，由于张、杨接受了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所以他们提出的“内求和平，外求抗战”的宗旨和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完全一致。《双十二事变在陕北》的作者，敏

感地抓住了西安事变同党的统一战线的关系，对比分析了张、杨八项救国主张与瓦窑堡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文件的异同点，然后得出结论说：“这次惊天动地的双十二事变，虽说发生在西安，归根说起来早在陕北酝酿着，简直可以说发生在陕北。”^①中共中央在“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也说，张、杨发动事变是“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所以中共中央及其所派代表团在政治上、军事上均给张、杨以实际的积极的援助。12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西安方面，提醒他们注意南京方面的军事动向，特别要注意潼关方面的樊嵩甫和咸阳方面的万耀煌。为了对付何应钦，建议东北军愈集中愈好，但却不可丢掉兰州。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通电，肯定张、杨的爱国行动，赞扬他们是“抗日救国之贤豪”。红军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进驻三原、泾阳、商县一带，准备配合张、杨部队回击“讨伐军”，制止内战。中共中央的这些措施，对张、杨起了壮其胆、鼓其气的作用。

在张、杨与宋氏兄妹谈判期间，红军代表团支持张、杨的八大主张，提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同张、杨采取一致的原则立场。经过两天谈判，周恩来因势利导，促成西安与南京双方达成六项协议。周恩来的工作卓有成效，说明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宋美龄也承认，周恩来是“有力分子，”“甚明大体”。^②

①（学生呼声），第2期。

②（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47页。